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DUOYUAN WENHUA YU
HANYU WENXUE PIPING XINCHUANTONG

多元文化與
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

閻嘉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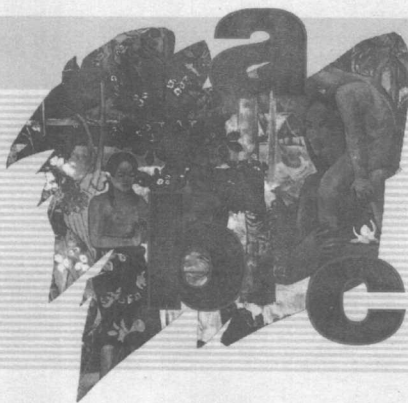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

多元文化與 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

閻嘉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多元文化與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閻嘉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5.6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7-80659-720-4

I. 多... II. 閻... III. 文學評論—中國
IV. I2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45493 號

多元文化與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

閻嘉 著

-
- | | |
|------|---|
| 責任編輯 | 李 蓓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4122206 |
| 版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開 本 | 850mm×1168mm 1/32 |
| 印 張 | 10.875 |
| 字 數 | 260 千 |
| 書 號 | ISBN 7-80659-720-4/I·236 |
| 定 價 | 25.00 圓 |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
▼
▼
▼
▼
▼
多元文化與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 周嘉 著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 蔣曉麗 著

異質文化語境下的女性書寫——海外華人女性寫作比較研究 肖薇 著

三葉集——德語文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 楊武能 著

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 陳思廣 著

文學智慧——走近西方小說 龔翰熊 著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段志洪 汪啓明

楊宗義

秘 書：姜 飛

目 錄

導 論	面對本土文學批評新傳統	1
一	多元文化語境與當代漢語文學批評	3
二	當代漢語文學批評的新傳統與面臨的困惑	9
三	探尋漢語文學批評出路的基本路向	18
第一章	文化與傳統的不同層面及其複雜關係	24
一	“語言的牢籠”：形式主義語言中心論	27
二	“冰山”之下的深層：文化與傳統的多重性	49
三	斷裂、延續與新生：文化傳統變遷的軌迹	70
第二章	中西二元思維定勢的新傳統與多元文化語境	93
一	中西二元思維定勢的新傳統與漢語文學批評	96
二	多元文化論：突破中西二元思維定勢的瓶頸	120
三	當代漢語文學批評及其新傳統的複雜狀況	144
第三章	追尋“現代化”：“唯新是尚”的新傳統	172
一	西方的現代化：中國的“目標”還是“鏡子”	175

二	中國的現代化：追尋夢想與新傳統的形成	198
三	焦慮症：“現代化夢想”的反思	230
第四章	意義建構與價值傳承：文學批評的使命	246
一	現狀與語境：當代漢語文學批評面臨的問題	249
二	尋找漢語文學批評理論建構的“坐標”	268
三	“邊緣”與風骨：作為知識分子的批評家	296
第五章	結語：面向新世紀的漢語文學批評	317
一	本土問題意識	318
二	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326
附錄一	主要參考文獻	335
附錄二	作者簡介	342
後記		343

導 論

面對本土文學批評新傳統

近年來，“全球化”（包括“地球村”）與“多元文化”（包括“本土化”）、現代與傳統、中國與西方、“中心”與“邊緣”、主導文化與通俗文化等問題，成了漢語文學批評與理論界（本書主要討論中國大陸的漢語文學批評和理論狀況）的重要論域。圍繞着這些論域，出現了不同的理論主張以及對它們的反撥，諸如關於“中華性”的理論構想，關於重建中國古代文論的主張，以及對“全球化”、“現代化”、“現代性”的呼喚與擁抱^①。實際上，這些論域所涉及到的問題之多，問題之重要，問題之複雜，幾乎涉及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的重大問題。在我看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些論域中，可以尋找

^①關於“中華性”，可參見張法等人的《從現代性到中華性》一文，載《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關於“重建中國古代文論”的主張，可參見曹順慶等人發表在《文藝爭鳴》1998年第3期上的筆談，以及曹順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載《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版。關於“全球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問題的主張，可參見陳曉明的《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一書，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陶東風的《文化本真性的幻覺與迷誤》一文，載1999年3月11日《文藝報》。此外，有關“現代性”問題的論說，近三年來已成為中國文論界的熱門話題，有關論著也非常多，參與討論的主要有錢中文、王嶽川、周憲、陶東風等學者。

到漢語文學批評界所面臨的真正困惑，以及探尋出路的基本路向。本書試圖就它們涉及到的一些關鍵概念和理論上的迷誤，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使用“多元文化與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這個题目的意圖在於：第一，我認為它可以較好地把上述似乎分隔的論域集合在一起，從而考察漢語文學批評面向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第二，我認為它也可以揭示出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即文化與語言、文學批評和理論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繫。當我們在文學批評和理論的範圍內使用“漢語”這個詞語之時，實際上是強調和突出這種語言所包孕的文化內涵，強調語言是文化及其傳統的表徵，進入一種語言就是進入一種文化。曹順慶先生強調說：“所謂漢語批評，核心是一個漢語性問題。”“所謂漢語性在這裏不是一個語言學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學概念，‘漢語’不祇是指表達層面的東西，而是指以語言為標誌的民族文化的建構。”^①這個看法，正可以作為我的觀點的支撐。第三，我認為，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學批評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已經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學術傳統，它們是在二十世紀特殊語境中本土舊傳統與外來文化影響相互碰撞和交融的產物，包括中西二元思維定勢的傳統、追尋文學“現代化夢想”的傳統、社會功利主義的傳統、線性進化論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文學革命的傳統、現實主義的傳統等。它們是二十世紀留給漢語文學批評的獨特遺產。它們的客觀存在，深刻影響了漢語文學批評在百年歷程中的發展和走向。當我們在新世紀試圖進行新的理論建構時，當代漢語文學批評的各種新傳統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本土現實。如果忽

①曹順慶《論文學批評中的漢語性》，載《求索》2001年第3期。

視這種本土現實，就有可能出現理論走向上的迷誤。

因此，本書的主旨在於：探討當前多元文化語境中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的主要方面，明確本土文學批評的現實狀況以及困境之所在，以便我們在當代多元文化發展和跨文化對話中保持清醒和理智的頭腦。

一 多元文化語境與當代漢語文學批評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是世紀之交中外理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不僅僅在文學理論和批評當中）。然而，當我們在操着這兩個時髦的外來詞語進行言說的時候，應當反思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詞語界定的問題，即這兩個詞語的確切含義是什麼；其次，無論它們的含義是指什麼，它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與實際情況相符，尤其是與當今中國特殊的語境到底在何種程度上相符。我們已經看到，有些中國學者對“全球化”的進程似乎堅信不移，斷言這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①。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在這種樂觀姿態的背後時常隱藏着一種誤解：把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全球化”，理解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全球化”，似乎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捲入了全球一體化的過程，這意味着全球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將全面趨同，進而認為這種全球一體化是我們最終的走向和歸宿。從文化方面來

^①例如，有論者說：“二十世紀的歷史上演到了最後一幕，全球化終於成為——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現實。資訊、技術、商品、人員——尤其是貨幣資本正在全球範圍空前頻繁地往來，市場的開拓與擴張有力地突破國家、民族、文化風俗以及意識形態劃出的傳統疆域。”“不論是國際關係、政治利益、社會財富分配方式、文化霸權還是日常生活，全球化無不顯示了深刻的後果。”參見南帆《全球化與想象的可能》，載《文學評論》2000年第2期。

說，他們把“全球化”理解為全球文化的同質化、一體化或者西化。在這種樂觀態度的背後，我們實際上可以隱約發現一種經濟決定論的簡單化路向。其實，這種態度，不僅誤解了“全球化”的含義，而且也誇大了“全球化”進程的力量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很容易使我們產生理論方向上的錯覺和迷誤，使我們把複雜的文化和文學批評問題簡單化。

不錯，“全球化”的確是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着的一種進程；但它主要還是一種經濟方面的進程，其含義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是指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的擴張，不能把它的含義任意擴大到一切方面。有論者指出：“所謂‘全球化’，意指一批金融精英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整個世界，造成商品和服務業價格指數的升揚，使財富再度由本來就貧困的非西方國家流向本來就已經十分富裕的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跨國秩序，使國與國的界線名存實亡，勞動力和收入都由世界性的巨頭所控制。”^①在我看來，對“全球化”的這種理解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它突出了“全球化”過程的經濟實質。多年來致力於思考和研究現代化、全球化與地方知識普世化的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強調說：“全球化並非同質化，也未必是一體化。固然，西化、現代化和當前的全球化都以動力橫決天下，因此都具有衝破界域和打開網羅的潛能……科技、資訊、金融、貿易等全球化的趨向更是來勢兇猛。然而，全球化並沒有消解差異。水漲船高的比喻（一種樂觀的預言）不能掩飾貧富不均的距離在各層次（全球、區域、國家和地方）急速增大的現實。差別導致異化、分離

①盛甯《人文困惑與反思》，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82頁。

和歧視，使得地球村更多元多樣，更分崩解析。”^①杜先生的這段話，對於我們認真反思“全球化”問題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當我們把“全球化”定位於經濟領域時，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就不僅僅在於中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全球化”的進程^②，更在於經濟方面的“全球化”對漢語文化和文學批評有什麼影響。不言而喻，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目前中國學術界正在對此展開熱烈的討論，意見較為分歧^③。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經濟方面的“全球化”是否也必定意味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在“全球化”或者已經“全球化”？或者說，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否被“全球化”？顯然，對這樣的問題做簡單的肯定或否定的解答，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對文化和文學研究來說，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應當承認，“全球化”的確是我們在思考和研究文化與文學問題時的一個大背景。這樣一個背景的意義在於：它促使我們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的情況下來反思經濟與文化、文學、文學批評的關係。換句話說，這個背景使我們已經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文學批評自身來進行研究，而要把它置於更大的社會語境之中，纔有可能考察文學批評在當代社會中的走向。

在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也是人們熱衷於提及的一個概

①杜維明《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未刊稿。亦可參見他的《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一書，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43-253頁。

②例如，在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必須承認，從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狀況來看，這種認識是符合中國目前實際情況的。一些論者可能過分誇大了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的速度和深度。

③例如，2001年8月初，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在北京召開了主題為“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文學與人”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96位國際和國內學者的會議論文摘要，《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和《文藝報》等重要報刊刊登了一部分與會者的論文或論文摘要。

念。幾年前，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被引進中國，成了“多元文化”言說的一個理論來源^①。但是仔細考察，暫且不論“文明衝突”論與“多元文化”的言說之間在實質上的差異，我認爲，在當代中國討論“多元文化”，理應在兩個不同層面上展開：一個是漢語文化與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多元”交流和對話，另一個則是漢語文化圈內部的“多元”價值取向。區分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對於我們的研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真研究這兩個層面上的“多元文化”的現實狀況。

就世界範圍而言，一些中國學者在談到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交流和對話時，其實心目中想到的往往是中國與“西方”這兩個“元”^②，很少涉及除“西方”之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③。從總體上回顧多年來的漢語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我們很少深入研究漢語文化與文學，同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大洋洲文化、太平洋地區文化之間的

①關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可參見《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文明的衝突》，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3年10月第19期。近年來，大凡討論“多元文化”問題的學者，都會提及亨廷頓的理論。

②在漢語學術界，近百年來，“西方”始終是一個漂浮不定的概念。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研究者那裏，有着極爲不同的內涵，例如，它可以指歐洲或歐洲的某一國某幾國，可以指俄國或東歐，可以指美國，等等。在我看來，研究“西方”概念在漢語學術界的演變歷程，將是一項有趣的課題。

③但是，有少數學者，如季羨林、金克木、曹順慶、樂黛雲等，十分重視西方之外的文化。季羨林先生對印度文化有着深厚的素養和研究，金克木先生翻譯過印度婆羅多牟尼的《舞論》等重要理論著作，曹順慶先生幾年前主編了國內第一部《東方文論選》，並在“緒論”中說：“東方文學理論，尤其是古代文論，無論在理論體系與基本範疇上，都具有不同於西方文論的民族特色與較高的理論價值。遺憾的是，東方文論的歷史地位與理論價值卻長期被西方學者所輕視和忽略，有時甚至是被東方學者所忽視！一個嚴峻的事實是：在西方文論選與西方文論史論著幾乎汗牛充棟之際，在國內，甚至在海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東方文論選！……這種不正常的狀況亟待改變。”參見曹順慶主編《東方文論選·緒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應當說，在中國學術界的西化主潮之中，這些學者是具有遠見卓識的。

“多元”與“對話”，我們很少深入研究世界上那些經濟落後的國家與民族的文化。為什麼我們心中就祇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而少有其他民族和國家？我們的學者動輒援引的是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格爾、康德、索緒爾、海德格爾、德里達、福科等等，對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理論則視而不見。

其實，這種狀況遠非始於今日。如果我們回溯歷史，實際上可以發現這種狀況源於近代以來時隱時現的中、西之爭，以及從未斷絕並交替出現的“中國中心論”與“西方中心論”。儘管學者們現在大都迴避這一問題，但在中國和西方這“二元”之間來思考和研究問題，始終是漢語學術界擺脫不了的“情結”。進一步說，中西二元的思維定勢，是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漢語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的新傳統。這應當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面臨的一種真實狀況，即在世界範圍內，我們的學術視域基本上祇局限於中國與西方這兩個維度。倘若我們再仔細考察，把視域固定在中國和西方之間，這種新傳統隱約折射出的或者是一種“天朝大國”的心態，即對漢語文化本身的自信，或者折射出的是一種“矮人姿態”，即對漢語文化傳統的鄙薄。在另一方面，這種新傳統也隱約折射出的是單純經濟決定論的思維定勢^①。

在漢語文化圈的層面上，1978年以後，隨着中國社會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出現了話語權力的位移、知識分子角色的轉換、商品文化與通俗文化的衝擊、各種現代媒介的控制與操縱等文化上的變化。就文學批評而言，二十多年當中，批評潮流和觀

^①我以為，一百多年來始終揮之不去的中西問題，其深層原因極為複雜。這個問題與中國近代歷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各種問題糾纏在一起，決定了二十世紀漢語學術界的基本面貌，並形成了難以擺脫的中西二元思維定勢的新傳統。

念隨時而變，呈現出了一種“多元”的局面，改變了1978年以前文學批評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狀況。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人文精神”的呼喚，對回歸傳統“尋根”的焦慮，都可以看作是對上述多元格局的回應。也有人把這種現象歸之於歷史轉型期必然出現的情形，或者稱之為“雜語共生”。通過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現狀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多元格局存在的現實，比如純文學、先鋒文學、武俠小說、歷史小說、網絡文學、市井小說、言情小說、犯罪小說，甚至還有所謂“美女文學”等等，它們構成了“多元”的典型表徵。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共同趨勢便是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即文學批評和理論已經不再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中心，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理論資源的觀念——中國的、西方的、古代的、現代的、高雅的、民間的、先鋒的、正統的——雜然紛呈，使當代漢語文化的空間得以大大拓展。無論我們對這種“多元”共存的現象是贊成、歡迎，還是反對、批評，它都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和研究的，因為至少在目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這種局面還是一種要延續下去的趨勢。

倘若我們堅持從現狀出發，從漢語文化和文學批評本身的真實情況出發，便很容易看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並沒有從根本上被改變，無論在世界範圍內還是在漢語文化自身之內，多元並存或雜語共生的現象依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誠如有人指出的：“從比較文學的視野來看，文學及其文學觀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或國別差異，在文化多元發展的今天，一體化的所謂‘世界文學’還是一個神話，跨文化的文學理論‘大全’還十分遙遠。”^①多元文化語境構成了我們討論漢

①杜衛《作為一門學科的文學理論》，載《文藝研究》1999年第5期。

語文學批評的大背景，也是判斷和評價當下漢語文化和文學批評的基本前提，是制定漢語文學批評基本策略的出發點，是漢語文學批評理論建構的基本依據。因而，我們對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的考察，也必須置於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語境之中。

二 當代漢語文學批評的新傳統與面臨的困惑

從上述簡略的分析來看，我們感到，世紀之交的漢語文學批評界和理論界所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的衝擊和震蕩所帶來的一系列深刻矛盾與困惑：學術上的“無根”狀態，難以擺脫的中西碰撞和交融，生活世界同理論建構的疏離，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衝擊之下的日益“邊緣化”，以及“現代化焦慮症”。可以說，當今漢語文學批評和理論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與這幾個方面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下面，就這裏提出的這幾方面的矛盾與困惑作一個概述。

第一，學術上的“無根”狀態。說當代漢語文學批評在學術上“無根”，很有可能會招來激烈的批評。然而，祇要我們不是情緒化地對待這個問題，就會看到事實的確如此。這種狀況一方面起因於我們主動地背離自己的文化傳統^①，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們對西方文化的隔膜和誤讀。晚清以來，在“救亡圖存”和追尋“現代化”的社會語境中，我們一步一步地遠離和拋棄了漢語文學批評的傳統，把傳統的價值體系、範疇體系、言說方式或者當作封建餘毒加以批判，或者把它們當作過時的古董而不屑一顧。即便如人們所推崇的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和理論方面也痛感

^①這裏所說的“傳統”是指以文本方式保存下來，並在歷代受到重視的文人的或學者的傳統。在我看來，“傳統”更為重要的另一個層面是一個社會中人們身傳口授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習慣。後文將對此作詳細討論。

自己的文化傳統與當時社會語境的分離和矛盾，極力用西方的理論來切割、改造本土的傳統。在延綿一百多年的批判、否定和背離傳統的趨向中，有過兩次高峰：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和1980年代之後。與此同時，我們積極地“別求新聲於異邦”（魯迅語），把外來的理論模式和遊戲規則運用於一種不同語境的異質文化之中。結果，造成了漢語文學批評在整體上的“異質化”和“失語”。這種“異質化”和“失語”是指：漢語文學批評的知識背景、知識譜系、學術規範伴隨着社會轉型而發生了整體性的切換，從學科劃分到知識形態，從言說方式到話語規則，都整體性地將以邏各斯中心主義為背景的“西學”移植過來；其典型特徵是各種理念和主義先行；其結果是文學批評與理論的內涵和言說方式同本土生活世界的疏離，學者們的言說與現實的文學經驗相脫節，與人們的生存狀態相脫節，也與漢語文學批評的傳統相背離；原有的漢語文學批評的概念、範疇、術語等等，成了移植過來的理論框架和言說方式的“例證”、“注腳”。這樣，實際上造成了我們在漢語文學批評中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上主動地背離傳統，然而又沒有完全融入到外來的文化之中，因而陷入“失語”。錢中文先生認為，“‘五四’文化革命以激進的態度，否定了舊有文化傳統，於是形成了與原有文論的中斷”，因此，“所謂當今文論的‘失語症’問題成了引發討論的話題”，“大家的共識是，我國古代文論必將成為新的文論建設的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當代文學理論的建設，祇能以現代文學理論為基點”，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轉換^①。不過，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文化“異質化”和“失語”現象，在改變本土舊傳

^①錢中文《再談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載《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